

金嵌玉镶秀伤寒——序《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

★ 温长路 (中华中医药学会 北京 100029)

关键词:伤寒论;四库全书;中医药文献

中图分类号:R 222.2 文献标识码:B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传承中,文献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医药文献的作用亦即如此。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对经典的阐释以关涉现实、以接续传统与未来,不仅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医药学发展的主要方式。中医药典籍卷帙浩瀚,目前已知的约有 3 万余种,可见到的有 1 万余种。这些古典医籍文献与信息资源,蕴藏着世界上独有的巨大的人类生命科学信息,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价值,被国际上称为“人类医药学的原始资料”。证明这些财富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文献。在中医没有正规教育机构之前,中医药知识的传播靠的就是对文献的学习和领悟。中医药文献,是中医学传承的载体,承载着中医学数千年的文明史、成就史,使之薪火相传、与时俱进。关于文献著录的工作,“本属历朝承平时代之常事”,但清代对《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政府方面文化事由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这回和前代却有点不同,的确有他的特别意义和价值”。“这种事业从前只有私人撰述——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铎《直斋书录解題》等,所有批评不过私人意见,《四库全书》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为向来著述未曾有。当时四库馆中所网络的学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门学问的专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政府出面组织,集专家集体智慧,就资料的可信性、著作的权威性而言,《四库全书》所汇集的清以前多学科的重要史料,在我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其中收录的大量医学类书籍,是认识中医学、研究中医学弥足珍贵的史料。

得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编纂出版《四库

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的消息,心中激动不已。盛世兴文,能把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从想法变为现实,的确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大动作。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对中医学传承工作的重大贡献。从选底本到找校本,从加标点到添校释,从补遗漏到纠讹误,从编目次到写校记,工程之巨之大、之繁之琐、之艰之辛、之苦之难是可想而知的,应当感谢他们的创造性劳动。

《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形成、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医学的关键性支撑和主体构造之一,是张仲景对人类社会的最伟大贡献。以《伤寒杂病论》为核心的仲景学说,影响了中国医药学近两千年的发展、兴亡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研究仲景学说、不承袭《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思想,就很难说医论道。

自《伤寒杂病论》问世始,围绕张仲景学术思想的研究之风就日渐兴起,且呈愈来愈炽之势。在《隋书·经籍志》之前,《伤寒杂病论》是以“仲景方”的称谓出现的。现存文献中可以看到,除我国的《小品方》残卷外,国外的《朝鲜史》卷十中也有原汁原味的记述,日本国也可以找到相关内容的材料。后世看到的《伤寒杂病论》的前半部《伤寒论》,是在其成书 100 年左右,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整理、编次之作;《金匱要略》被发现得更晚,是大约于成书 800 年之后,才被北宋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中发现的。后来,二书又经过宋代林亿的校正,而得以刊行和广泛传播。以《伤寒论》言,如果把王叔和的编次本称为“祖本”的话,一源三流,由它派生出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子本”莫过于唐代孙思邈(习惯上

称为《唐传本伤寒论》)、金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和明代赵开美(习惯上称《宋本伤寒论》)所整理、研究、注释、校勘的三个珍本了。后世研究《伤寒论》的专著虽多,但从脉络上看,均是从以上三个珍本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孙本”。根据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年编辑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和笔者从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等专业图书馆及国家和首都图书馆检索到的内容,结合从其它途径搜集到的相关资料证实,目前在国内可以看到的《伤寒论》的各种版本多达600种,刊刻次数在1000次以上,其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1700多年间,共刊印过近400种,其中以清代出版的本子最多,总数超过100种。这些版本,有根据原著重新分类编次的,如明代赵开美的《仲景全书》(1599年初刻本)、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1592年歙县方氏刻本)、清代喻嘉言的《伤寒尚论篇编次仲景原文》(1648年锡环堂刻本)、张志聪的《伤寒论纲目》(1673年刻本)、日本内藤希哲的《伤寒杂病论类编》(1819年日本大岛燮即省庵刻本)、山田正珍的《伤寒论集成》(1879年日本杏花园刻本)等;有根据原文逐条注释校勘的,如金代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元刻本,195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清代张锡驹的《伤寒论直解》(1712年钱塘三余堂刻本)、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1797年三让堂刻本)。相比之下,《金匱要略》的本子少于《伤寒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共出版有60种上下。《伤寒论》与《金匱要略》合刻的本子(即《伤寒杂病论》)数量也不多,现在所能看到的不超过100种。

一个学说的构建,与其本身的影响和社会对它的承认和应用情况是分不开的。一般说来,从事研究的人数越多、应用的范围越广泛、涌现出的成果越非凡的,其学术成就也越高、社会影响越大,学说构建也越完整。仲景学说的构建,除了张仲景本人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性劳动之外,与后人长期不懈地继承、发挥、完善、补充、研究、发展是分不开的。从真正意义上说,仲景学说是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及其人文思想为核心的数代医家研究成果的汇集和经验结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从金元时期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开始,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性著作如雨后春笋一般,亮相于中国乃至世界医药学的大舞台上,代有鸿篇巨制,年有新鲜华章,成为祖国医学发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1000多年间,出版的这类研究性著作已达400种左右。这些著作,在主题选择上,

或紧密联系《伤寒杂病论》原文进行阐发,如明代王肯堂的《伤寒准绳》(1604年刻本)、清代张璐的《伤寒大成》(1666年雋永堂刻本)、庆恕的《伤寒辨证》(1903年刻本)等;或按仲景的本义进行演绎,如宋代庞安石的《伤寒总病论》(1823年黄氏士礼居刻本)、明代朱肱的《伤寒类证活人书》(1591年刻本)、清代徐彬的《伤寒百十三方发明》(1667年刻本)等;或是研究者自我经验的介绍,如明代王震的《王氏家宝伤寒证治明条备览》(1561年双泉书斋刻本)、陈文治的《伤寒集验》(1633年四川布政司刻本)等。在表现形式上,除以论述为主导的基本方式外,也有应用问答形式表述的,如清代舒位的《伤寒问答》(1870年古冈刘氏藏修书屋刻本);以表格形式直观表述的,如元代吴恕的《伤寒图歌活人指掌》(1600年闽乔山堂刻本)、清代包诚的《伤寒审症表》(1871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以歌赋形式表述的,如元代宋叔微的《伤寒百证歌》(元刻本)、宋代钱闻礼的《伤寒百问歌》(1309年刻本)、清代吴谦的《伤寒心法要诀》(1742年尊经阁刻本)、陈元犀的《金匱方歌括》(1836年南雅堂刻本)等。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著作对于增大仲景学说的外延、扩大仲景学说的影响和对仲景学说的传承、发扬是具有无可替代意义的。

面对如此庞大的著作群,人们要在自己有限的视野中去发现它、认识它,并想在有限的人生中去读完它,显然是不现实的,历史上的许多研究者都是带着这种珍本难寻、望书兴叹的遗憾而去的;就是到了传播途径多样化、快捷化的今天、今人,要想全部接触到这些秘笈也是非常困难的。《四库全书》的策划者们,以敏锐的思维、广阔的视野,博览群书,集万为一、化繁为简,从浩瀚如海的古医籍中挑选出若干种精品来供人们研读,实为中医学的广泛传播做了一件有创意的善事。《四库全书》著录书3457部,79070卷;存书目6766部,93556卷,编成后共缮写七本,颁储于各地:存于北京紫禁城的称“文渊阁本”,存于北京圆明园的称“文源阁本”(清咸丰年间毁于英法联军),存于奉天(今沈阳)的称“文溯阁本”(后移存北京),存于热河(今承德)的称“文津阁本”(后移存北京),存于扬州的称“文汇阁本”(毁于洪杨之乱),存于镇江的称“文宗阁本”(毁于洪杨之乱),存于杭州的称“文澜阁本”(洪杨之乱半毁,后补抄,存浙江图书馆)。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对《四库全书》的全面整理中确定,该书收录的有关伤寒类专著共12种86卷、散在性伤寒类书籍共16种90卷,两者的总数量占《四库全书》中全部

医学类书籍的四分之一强。这些著作,既尊古明礼,又包容大度,或为伤寒学说的开山之作,或为伤寒学说的立派之书,或为伤寒学说的扛鼎大餐,或为伤寒学说的稀世孤本,共同构建了伤寒学说研究中具有主体作用的代表性文库。《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以文渊阁本中的伤寒类书目为整理对象,同时参照文津阁、文溯阁本的相关内容,应该说是可靠的和稳妥的。《四库全书》所选的这类著作的取舍原则,与所能见到的有关伤寒学说的全部著作相比,虽然也有缺陷,如孙思邈的《千金翼方》未能收入,使人们不能窥见其中收入的《伤寒论》的原貌;成无己的《伤寒论注释》收入的是无图本,内容不如有的图本直观等,但也收入了一些《四库全书》成书前已经或濒于失传的散在性珍本,如《永乐大典》、《普济方》中有关伤寒学说研究的辑录本等,保存了明代之前有关伤寒学说研究的大批重要资料。白璧微瑕,千虑一失,从总体上评价,《四库全书》对书目的选择标准还是比较客观的,所选伤寒类书目的品味和分量基本上都是被医界认可的,对伤寒学说的传承功莫大矣!针对客观上存在的这些问题,负责此项工作的安徽中医学院的王旭光教授和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编辑们,想方设法进行弥补,把其他本子中的《注解伤寒论》的画图和《四库全书》本中未收入的序言、凡例等找来补入,作为各构成本的附录,较好地解决了历史造成的这一遗憾。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一套三册,不仅把《四库全书》中有关伤寒类的数目进行了全面、系统、认真的梳理,集成《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而且把《四库全书》存目中的 14 种伤寒类医著和《续修四库全书》中的 26 种伤寒类医著进行了挖掘、整理,集成了《四库全书存目伤寒类医著集成》和《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作为对《四库全书》中相关书目的补充和扩展,既比较全面的再现了清之前《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传承的全貌,又为今人的学习提供了一部更集中、更明快的范本,使伤寒学说的发扬光大、传播普及又上了层楼,功莫大矣!

与西方的哲学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不是在否定中前进的,它的连续性和渐变性特点决定了它以继承为主旨的道路。中医文献学的研究方向,从本质上应该定位为继承的。通过经典的阐释以表达思想,温故知新,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式。如果把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

而》)的话作为阐释继承与创新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的准则,很显然,“信而好古”,就是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前提。“好古”的实质,不是对古之实存性上的仰慕,而是出于对古今一道的领悟和文化生命连续性的契合。要相信历史、相信古人、相信古籍,因此要下大力气把古代遗留下来的财富挖掘好、研究好、继承好。对于古籍的态度,章学诚“临文必敬,论古必恕”(《文史通义》)的话值得借鉴。

历史文化,总是因时而进,日新月异,故每一时代必有其“作”。“述而不作”,是“信而好古”基础上的行为,属于孔子的谦辞或语言上的另一种表述方法。实际上,孔子是“述而又作”或“又述又作”的。他不仅强调了“作”的严肃性,而且是把“作”视为创新看待的。孔子的“述、作”精神,实质是提倡古今的贯通,所体现的就是质与文、自然与文明的连续。亦即司马迁追求的“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少卿书》)。中医文献同样存在着如何创新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解决好与继承的关系。创新的方式,可分为挖掘创新(在整理中创新)、改良创新(在继承中创新)、原始创新(在发展中创新)等多种,原始创新固然代表着创新的方向,但是非常不容易成功的,或许这正是影响中医学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按照中医文献学研究的特点,挖掘创新和改良创新应作为主要的方式,换句话说,继承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创新;同时,要在尊重中医学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探索原始创新的问题,推出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手段、新的技巧,以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事业不断增高的需求。“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应该是中医文献研究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四库全书伤寒系列类医著集成》,正是在这条方针的指导下集古传今、亦述亦作、古为今用的。

文化是属于社会的,中医也是属于社会的。在中国,要向全民普及文化教育,同样需要普及中医教育。当前这种广袤、和谐、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也同样给中医药文化的复兴带来了良好的机遇,给中医文献研究工作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只要我们去努力、去奋发,就一定会大有可为的。

《四库全书伤寒系列类医著集成》付梓之际,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邀我作序。写上这些话,以为祝贺。

(收稿日期:2009-01-13 责任编辑:蒋力生)